

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史编纂 ——兼谈西方地理学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王鹏玮✉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武汉 430000)

摘要 民国时期的地理学者逐渐意识到,地理学史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立近代地理学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学者在翻译了一定数量的地理学史论著,了解了近代地理学的基本谱系后,开始自行编写地理学史。在此过程中,不同地理学思想影响了地理学史的写作,学者们写出了风格多样的地理学史。一些地理学者还以西方地理学史为参照,考察中国地理学史。他们或认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已包含近代地理学的要素,或认为其中基本不具备可称为地理学的内容,类似争议反映了学术观念的歧异。地理学史论著可以成为我们观察民国地理学观念的重要材料。

关键词 地理学史;人地关系论;南派地理学;中华地学会;王庸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25)01-0057-15

近代中国科学观念产生之后,带来了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变。^[1] 有志之士除了积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探索科学史的写作。科学史论著的编纂者试图通过编纂科学史来确立近代科学的发展谱系,以帮助中国建立新式科学体系。民国的地理学者也是如此,他们逐渐意识到地理学史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对于建立近代地理学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学者在翻译了一定数量的地理学史著作,了解了近代地理学的基本谱系后,开始自行编写地理学史。

目前已有学者讨论了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史写作。张雷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徐霞客在民国被“再造”的过程,丁文江、竺可桢等学者挖掘了徐霞客论著的地理学价值,将其塑造成一位以科学精神治地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地理学家,意在将西方地理学方法嫁接于中国文本之上,建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范式。^[2] 唐晓峰选取了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几部地理学史著作,讨论了一种“反向格义”式的地理学史写作,即以自然地理为主要指导思想,来重审中国地理。^[3] 孙俊、潘玉君反思了中国地理学史的编史方法,

收稿日期: 2021-08-24; 修回日期: 2022-06-29。

作者简介: 王鹏玮,1993年生,湖北襄阳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史、思想文化史,Email: wpw2022@163.com。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社科青年项目“民国小学社会科教育中的中华民族观念”(项目编号:CSQ23034)。

简要提及了民国的地理学史论著。^[4-5]这些研究揭示了地理学史写作背后的地理学观念,深化了我们对于民国地理学发展的认识,但仍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并未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思考地理学史对地理学发展的意义。其次,上述文章仅讨论了民国学者的中国地理学史写作。民国学术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在考察民国时期地理学史的编纂时,不能忽视学者们对西方地理学史的翻译、介绍和写作。再次,上述研究多聚焦个案,并未从整体层面思考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史写作。例如,民国学者对徐霞客的挖掘仅是一例,他们还挖掘了其他学者与文献。这表明类似“再造”可能是一种学术趋势。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史写作(包括西方与中国的地理学史)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民国学者对地理学史地位与重要性的认识;其二,民国学者对西方地理学史的翻译、介绍、写作;其三,民国学者以西方地理学史为参照,来编纂中国地理学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选取的地理学史论著并非以题名为判断依据,而在于著述主旨是否属于地理学史的范畴。这些著述就写作内容而言可以分为:(1)综论某一时期地理学发展,可理解为通史;(2)对历史上地理学相关人物或典籍的研究,可理解为专史。就写作形式而言,大部分论著单独成书成篇,即专论,少部分论著放置于地理学理论著作之中。就作品的国别与地域来源而言,既包括翻译引进的地理学史,也包括国人自行撰写的地理学史。这样做可以更为全面地考察民国时期地理学史的编纂情况。

1 地理学史的地位:民国学者论地理学史

本节将探讨地理学史在民国地理学者心中的地位。就笔者所见,至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有国内学者将地理学史视为地理学的一部分。1929年张其昀(1901—1985)发表了《地理学与大学教育》,引用美国地理学家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之言,认为地理学存在八大柱石:地文学、气候学、植物地理、动物地理、人生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6]1934年张抡波延续了张其昀的观点,将地理学史看作地理学的组成部分。^[7]同年任美镠(1913—2008)也发表了类似看法。^[8]

1935年,张其昀撰写长文《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①,试图阶段性总结民国地理学成就,时间范围大概是1914—1934年。该文依据研究对象将地理学划分为15个门类,即地图学、地球物理学、地文学、气候学、水理学、海洋学、生物地理、人类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方志学、地理教育、地理学会,地理学史。^[9]1942年,林超把地理学分为三部分:(一)为通论地理,包括甲部和乙部,甲部为自然地理学,包括数理地理、气候学、地形学、水界学、生物地理等。乙部为人生地理学,包括人类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二)为特论地理,也就是区域地理;(三)为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10]林氏分类中的通论地理与特论地理,即系统地理与区域地理,这是所谓地理学“二元论”的

① 该文亦是为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二十周年”而作,并且同时发表于《科学》与《地理学报》。见张剑:《中国科学社的科技史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8年第2期。

产物^①，地理学史与历史地理则被列在此二项之外。

地理学史逐渐被地理学界接纳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地理系开设了相关课程。尽管直至 1939 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地理系和师范学校史地系的科目必修表，才正式设置地理学史课程^[11]，但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国内部分高校已开设地理学史课程。表 1 依据《中国高校地理学系概览》（1912—1949）整理而成：

表 1 民国时期高等院校开设地理学史课程情况表

学校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备注	院系概览出版时间(年份)
中央大学	地理学史	研究地理学之发达史	半年学程，每周讲演 2 小时，2 学分，本系四年级学生选习	1928、1930、1936、1937
暨南大学	地理学史	有较为详细的课程纲要，如（12）近代地理学之发达、（16）李特儿以后之人文地理学。一共 21 节内容	四年级必修课，每周 3 课时	1936
清华大学	地理学史及探险史	讲述地理学发达之史略，兼及亚洲地学探测之略史	四年级公共必修课，2 学分	1929、1930
浙江大学	地理学史		选修课，2 学分	1937
勸勤大学	地理学史	任课教师为盛叙功，讲义后集结成《西洋地理学史》书稿	必修课，第四学年，2 学分	1936
广东文理学院	地理学史			1944
西北大学	地理学史		选修课	1947

（资料来源：孙俊，潘玉君等．中国高校地理学系概览（1912—194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从表 1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开设地理学史课程的高校不少，但可找到的教材不多。实际上，当时许多高校开设的地理学史课程更多的可能类似勸勤大学，以讲义为主，并无专用教材。就课程内容而言，这些地理学史课程多侧重介绍西方地理学发展史。就课程性质而言，必修课与选修课兼有，这表明民国时期大学地理系已认识到地理学史课程的重要性，但仍未完全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地理学史的科 学史属性也逐渐被认识到。1936 年，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朱谦之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史社”（The Chines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该社章程规定，社团的任务之一是研究中国各专门科学的历史，包括“天文学史、算学史、物理化学史、生物 学史、医学史、心理学史、地理学史、农业史、工艺史等”，地理学史名列其中。^[12]由此可见，地理学史受到了地理学者和科学史研究者的共同重视。

除了具有梳理地理学发展基本脉络的功能外，地理学者逐渐意识到，可以借助地理学史来讨论地理学的基本问题、表达学术旨趣。1931 年丘式训主张考察地理学的本质，可

① 哈特向指出：“普通地理学（即系统地理学）与区域地理学之分，因而就表现了地理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的整个发展的初期所特有的二元论形式”。见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7-28 页。

以从地理学史入手。^[13]刘国雄也认为:“地理学的来源是怎样及如何形成了近代的地理学,这些问题我们是不能不懂得一点的!”^[14]盛叙功(1902—1990)更是直言:

在未讨论本题之先,我们应该先对地理学演进的历史有相当的了解。因为一种科学的产生,决不是个人所创造;它和社会一般的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是跟着时代而不同,认识是随着研究者的立场而互异。地理学是从人类生活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科学,自然更不用说了。^[15]

上述文章均将地理学史置于文内,目的或是通过考察历史来讨论地理学的性质、方法论、研究任务、未来趋势,或是阐发学术观点,这在民国地理学界较为常见。

这种研究趋势并非中国所特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时期。同时,西方地理学也处于大发展阶段,关于地理学的性质、研究方法的讨论相当激烈。一些西方地理学者在讨论地理学的性质与方法时,也会借助地理学史,我们以两部地理学经典著作为例说明。区域地理学的重要代表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于1927年出版,他在开头言道:“要完全理解现在,永远只有从历史出发才有可能,同样,要充分理解一种科学,也永远只有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才有可能”^[16],该书的第一章即为地理学史。赫特纳的追随者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 1899—1992)的《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于1939年出版,他指出:“考察早期的地理学工作,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从事研究的领域的性质”^[17],该书的第二章是地理学史。赫特纳、哈特向通过撰写历史,来探寻地理学的性质^[18-19],表达自身学术观点。

显然,通过地理学史写作来讨论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在当时东西方部分学者中已成为一种共识。

2 建立近代学科:民国学者在西方地理学史方面的翻译与写作

民国时期,中国地理学深受西方地理学影响,最初在中国传播的地理学史论著,主要内容是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的西方地理学史。

目前所见最早由国内学者翻译的地理学史成果是刊载于《地学杂志》1921年第3期的《近代地理学之起源》,译者姚从吾^①,原版为苏格兰地理学家纽华金(Newbigin, 1869—1934)所著《现代地理学》(*Modern Geography*)一书第一章,该书于1911年出版,属于大学家庭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 of Modern Knowledge*),前一期《地学杂志》已有该书书评。《近代地理学之起源》将1859年视作近代地理学的新纪元,讨论了当年发生的两件影响深远之事:一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原文作洪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原文作鲁特)去世;二为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该文认为洪堡与李特尔二人对地理学贡献颇大,前者被认为是“大旅行家”,研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科,后者是位“名教师”,发明了“地球与人类行为之关系”。达尔文则为“人地相互间关系之研究”提供了理论

① 今日姚从吾更多地以历史学者闻名,实际上他对地理学也颇感兴趣,曾参与《地学杂志》的编纂工作,发表翻译大量文章。见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大历史学报》,1974年第1期。

基础。^[20]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地理学刊物,《地学杂志》较为重视此文,1922年第3期又刊载了盛叙功的重译版本。^[21]两位学者均只翻译了原书第一章,是因为只有第一章在讨论地理学史^[22],其他内容则为地理学的具体研究,这与上节提到的研究趋势类似,即先谈论地理学史,再讨论地理学的具体内容。纽华金此书在地理学界有一定程度的传播^[23],1933年王勤培翻译出版了全本。^[24]作为中文世界较早翻译引进的地理学史论著,此文对宣传洪堡、李特尔的近代地理学创始人地位可能起了一定作用。^①

1922年第1期的《地学杂志》刊载了由开尔底(John Scott Keltie, 1840—1927)和霍华茨(O. J. R. Howarth, 1877—1954)合著,潘维昽翻译的《地理学史》(*History of Geography*)第一章。该书于1913年出版,共14章,叙述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地理学史,是科学史系列著作之一。^[25]译者在绪论中指出,自西学东渐以来,无论是国人搜集的西学著作,还是国人的地理研究著作,均缺乏地理学史的内容,故而本文应当为试图治地理学之人必读,这从侧面证明了当时中文世界地理学史著述的缺乏。^[26]除了第一章外,《地理学史》的第二章“希腊人与罗马人之地理学”也由潘维昽翻译,并刊登于《地学杂志》^[27],这两篇文章聚焦于古典时代的地理学。之后,法国地理学派学者撰写的地理学史与他们的相关理论(“人地关系论”或“人生地理学”),也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被陆续引进翻译(下文详述)。

对海外地理学史的翻译与引介,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在继续。1933年葛绥成翻译了日本学者撰写的地理学史,主要内容是19世纪以后的地理学发展。^[28]1936年牟仁水的《人文地理学发达史》,参考了狄金森(Dickinson)和霍华茨(Howarth)的著作^[29],叙述重点放在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原文作拉则尔)之后。王勤培和楚图南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译有《地理学史》和《地理学发达史》^[30-31],实际上是同一本书,讨论的重点是近代地理学史。^②王、楚两位译者都曾任教于暨南大学,该校开设有地理学史课程,因此笔者推测,他们可能是出于教学需要而进行的翻译。

上述地理学史的翻译和引入,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引入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地理学史,因此关心地理学的学者可以通过阅读这些作品,了解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如创始人、核心思想、学术传承等)。这些学者可以利用掌握的知识,参与民国地理学科的建设。

其二,一些学者将洪、李之后的近代地理学与此前的地理学对立起来,强调二者的差异。如竺可桢认为:

十八世纪以前的地理学家,都注重于形势名胜疆域一方面;换一句话,地理两字,在那时候,为政治地理的代名,鲜有人讲及地理和人类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指出18世纪(洪、李活跃期)以前,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的忽视^[32];周立三

① 例如,1933年刘国雄所撰文章中的地理学史,其内容结构与纽华金的文章类似,有可能受到后者的影响。见刘国雄:《地理学是什么》,《教育论坛》,1933年第2期。

② 这两本书实际上就是狄金森与霍华茨合著的《地理学史》(*The Making of Geography*)。不同的是,牟仁水只参考了部分内容,而王勤培与楚图南是完整翻译。

亦指出,洪、李之前的地理学是“传统而陈腐之地理学,仅以胪列事物为务之旧观念”,^[33]实际上进一步强调了对“洪、李”之后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推崇。

除了了解近代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外,民国学者撰写的地理学史论著逐渐融合了自身的学术烙印与学术追求。接下来,本文将重点介绍几种受不同学术思想影响而撰写的地理学史。

2.1 南派地理学:人地关系论

1926年竺可桢翻译了法国学者马东男(Emmanuel de Martonne, 1893—1955)所著《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一书中的地理学史部分,并将其命名为《欧西地理学发达之历史》。文章指出:“欲稔知地理学上重要之原则与其内容,则最善之法,莫如一察地理学所历经之步骤,与其进化上所遭之更变。”通过梳理相关历史,马东男总结出了地理学研究的三大原则,即范围原则、综合原则、因果原则,最后得出结论,地理学是研究“人地相互关系”的学科。^[34]

另一位法国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 1869—1930)的地理学史著述,则由竺可桢的学生张其昀翻译,题为《人生地理学发达史》。^①“人生地理学”在当时指的是“人地关系论”^[35],该文也是围绕“人地关系论”的历史展开。^[36]

20世纪20年代,“人地关系论”(或“人生地理学”)在中国地理学界逐渐流行。张其昀于1923年发表《新书介绍:地理类十种》,着重评价了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 原文作白伦燮)的《人生地理学原理》,主张人、地是相互影响的。^[37]与此同时,竺可桢的另一位学生胡焕庸也提到“人生地理学”,指出这是“折中乎自然环境与人生情形之间而研究二者相互间之因果关系。”^[38]“人地关系论”主张地理学应当研究“人与地之间的关系”(或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民国地理学界的主流理论。^[35]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被认为是“人地关系论”代表人物的拉采尔和法国地理学派,在地理学史作品中的篇幅与重要性逐渐上升。

除了翻译之外,国人撰写的西方地理学史也陆续出现。任美锷1934年发表《现代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指出:“新地学特别注重人类与地面间的相互的关系”,拉采尔(原文作雷次尔)和法国地理学派在作者的历史叙述中被作为重点,作为“创始人”的洪堡与李特尔退居次要地位。^[8]

南派地理学者是民国时期推广“人地关系论”(或“人生地理学”)的主力,其学术源于南高史地学派,主要成员包括竺可桢、张其昀、胡焕庸、任美锷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与以黄国璋为首的北派学者并称^[39],是民国影响力最大的地理学派之一(该学派的部分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活跃于学术界)。南派学者重视从历史中找寻地理学因素,地理学史研究是他们的重要学术活动。

南派地理学者通过翻译、写作地理学史,强化对“人地关系论”学术史的介绍,来论证其重要性与合理性。

^① 该文后来出版了单行本,题为《人生地理学史》。见白菱汉著,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2.2 中华地学会：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前文提到的楚图南(楚曾),在1935年发表《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发达”是当时国内流行的地理学史论著(包括课程)的常用词,该词的使用表明作者持有一种较明显的进步史观。文章按时间顺序将人文地理学史进行了分期,包括“古代人文地理学”、“十五世纪以后之人文地理”、“李希霍芬”、“改良主义或相对主义”等。此文的最大特点在于提到了“新社会派”地理学,这一派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马克思,集大成者是魏特夫(Wittfogel,该文作威特弗格尔)。^[40]“新社会派”地理学主张在“人”、“地”之间要充分考虑“经济媒介”的作用,将其作为“中间项”来融入“人地关系”。同年,李长傅在介绍“地理学发展过程”时,也提到了魏特夫(原文作温特福喀尔)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这是一个新途径。^[41]

1936年,李长傅又发表《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将地理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记载地理学、自然偏重论、技术论、人地关系论,他认为最正确的方法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强调生产关系在“人地关系”中的重要性。^[42]1937年盛叙功撰写了《西洋地理学史》讲稿(该讲稿直到1992年才正式出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指出魏特夫(原文作瓦尔特·福格尔)的研究标志着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43]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民国地理学界有相当范围的传播,魏特夫的著作《地理学批判》(*Geopolitik Geograph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zismus*),由沈因明翻译出版^[44],丁逢白为该书撰写了书评。^[45]而楚图南、李长傅、盛叙功属于同一个地理学学术团体——中华地学会。

中华地学会成立于1931年,主要成员还有葛绥成、丁绍桓、刘虎如等^[46],有学者称之为“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学术团体”。^[47]中华地学会1932年开始出版会刊《地学季刊》,内有相当多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将其看作地理学发展的新方向。^[48]盛叙功、李长傅等人对魏特夫的推崇,与自身学术经历相关,他二人均留学日本,受到过左翼学者的影响。^[49]盛叙功翻译了日本学者黑正严的《经济地理学》^[50],李长傅翻译了拉茨罗夫斯基的《自然与社会之关系》^[51],均属此影响的体现。楚图南则早在1926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2]

中华地学会成员通过编译、撰写地理学史,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术史的介绍,来论证其重要性与合理性。

2.3 景观论和区域地理

民国时期流行的地理学理论还包括景观论和区域地理。正如保罗·克拉瓦尔所言,人地关系论、景观论、区域地理是19世纪以来地理学的三大主题,都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53]景观论强调研究“自然景色和人文景色”,代表人物是卡尔·索尔(Carl Sauer),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有国内学者对此做介绍。^[13,54]区域地理主张“研究特定区域的地理事实”,同样在20年代传入中国,并一度被张其昀等人译为“方志学”。^[55]20世纪40年代之后,哈特向的《地理学的性质》被李旭旦引入中国,区域地理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56]

随着民国地理学的发展,景观论和区域地理逐渐被纳入地理学史的写作范围。周立三在1941年发表了《地理学之对象及其任务》,文章第一节为“引言——地理学史之发展”,他在写作中加入了“景观”(Landschaft)学派,即在考察人地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地表

共存现象之空间研究,以地表景观作为重点考察的学派。([33],127-128 页)李旭旦亦撰文回顾地理学史,指出地理研究的重要趋势,包括“实体化”趋势与“区域化”趋势,前者即景观论,帕萨格(Siegfried Passarge)等人主张以此来纠正“人地关系”的空洞,后者即区域论,哈特向将其看作地理学的基本工作。^[57]1948 年,李春芬在介绍了洪堡与李特尔后,跳过多个学者与学派,直接论述赫特纳及区域地理发展史,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写作倾向。^[58]

上述几位作者都有相当程度的地理学理论积累。周立三 1933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曾经协助黄国璋在北碚建立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所,他积极参与地理学、地理教育的讨论,发表文章多篇,1946 年前往威斯康辛州立大学进修。李旭旦 1934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6 年考取剑桥大学,主攻人文地理,1939 年回国后前往中央大学任教。^[59]李春芬 1937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43 年获得加拿大第一个地理学博士学位^[60],后继续前往哈佛深造,1946 年回国。如果说南派地理学者和中华地学会成员是通过写作地理学史,来表达学派自身学术旨趣的话,这几位学者撰写的地理学史,则是为了引介地理学的新趋势。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的西方近代地理学史写作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首先,学者们经历了一个从翻译地理学史到自主撰写的过程,这符合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体趋势。其次,这些地理学史大多单独成书成篇,少部分附于理论性论著之中,内容一般是通论性质的通史。地理学史的写作目的包括梳理地理学发展基本谱系、辨析地理学的性质、表达作者的学术旨趣、介绍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等。再次,不同学派之间的写作确实反映了学术观念的差异,这不仅体现在写作重点上,也体现在内容取舍上。如中华地学会成员撰写的地理学史几乎未涉及景观论。而张其昀、任美锷等南派地理学者,以及周立三等学者的著述,则完全未提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最后,无论写作重点偏向哪一学派,人地关系论(或人生地理学)始终是地理学史写作中不可回避的内容,反映了人地关系论在地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体来看,人地关系论对民国地理学史写作影响深远,无论是西方地理学史,还是下文即将讨论的中国地理学史。

3 以西方地理学史为参照:民国学者编纂中国地理学史

中国拥有悠久的地理学编纂传统。民国地理学者在尝试建立中国近代地理学谱系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中国传统地理学。他们试图通过编纂中国地理学史,来连接传统与近代。部分民国学者在编纂中国地理学史时,以西方地理学史为参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民国时期写作西方地理学史者,有部分是具有中国地理学史关怀的,他们有意在地理学史写作中比较中外地理。换言之,当时引介西方地理学史和探究中国地理学史的作者,有一定的重合度。例如,上文提到的翻译过西方地理学史著述的姚从吾、竺可桢以及张其昀,都是讨论中国地理学史的主力。第二,以西方地理学为标尺评判中国地理。民国地理学者通过翻译和编写西方近代地理学史,了解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谱系与基本特征,如创始人是洪堡和李特尔,实地考察是重要方法,人地关系是核心理念等。部分学者在写作中国地理学史时,就以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作为参照,对中国传统地理进行挖掘,试图重新评估其历史地位。第三,进行时间维度的比较。在弄清了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后,部分学者在挖掘传统的同时,强调中国的近代地理学要素早于西

方,并非独属于西方,从而起到推广近代地理学的效果。总体来看,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两种观点。

3.1 认为中国传统地理中存在近代地理学的要素

相关研究可按类型分为人物研究与文献研究,前者关注地理学者,后者探讨地理文献。

3.1.1 地理学者

几位古代学者成为研究重点。首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竺可桢认为沈括在人生地理方面贡献极多。^[61]其次被重点挖掘者为徐霞客,丁文江率先讨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地理学价值(尤其是实地考察),其后竺可桢、张其昀以及浙江大学史地系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深入挖掘、论述徐霞客著作的地理学意义。^[62]不过,丁文江在研究徐霞客时,亦对其诸多观点未被重视深感惋惜。([62],1698页)

另一位被重新发掘者为清初学者刘献廷(1648—1695)。刘献廷,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博学多识,时人以“奇人”称之。早在清末,梁启超便撰文称刘献廷为“地文学”先驱。^[63]1922年,姚从吾指出,刘献廷的地理学以亲身调查为主,“尝观察自然界种种现象与人生消长之关系,归纳为种种公例,以推阐人地之关系”、“远数欧美今日治人生地理学者”^[64]。张其昀更是高度评价刘献廷,认为刘氏的“人地关系”观点早于拉采尔,堪称世上“最早最伟大之人文地理学家”^[65]。^①在论述之余,梁启超感慨刘献廷的学说“后亦无继也”^[66],姚从吾对刘献廷的学说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近代学术表达了遗憾([64],11页)。张其昀则指出,因为刘献廷的精神无人继承,所以导致中国地理学“但知堆砌事实,不能解释,琐碎陈腐,罕有生气,致来玩物丧志,小人怀土之诮,与西洋之旧地学患同病焉”([65],3页)。结合前文,张氏此文中的“西洋之旧地学”,应当指的是“洪、李之前的地理学”,张其昀在此文中进行了明显的中西对比。

3.1.2 地理学文献

一些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典籍被重点研究。其一是《汉书·地理志》,这是中国最早以“地理”为名的论著,因此受到民国地理学者的重视。姚从吾认为《汉书》中存在人生地理学观念^[67],除此之外,其他地理志在他看来“如开账单,千篇一律”、“如汉书地理志者绝少”([67],9页),实际上是大大降低了除《汉书·地理志》外其他地志的价值。楚图南对《汉书》的评价也较高,他在《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中谈到:“在东方,中国的汉书地理志,每说到一个地方的风俗及社会情形,常是将地理和别的社会环境作为解释的原因。因此,也有着不少的精辟的近于人生地理学的理论”([40],19页)。但楚也指出这样的传统并没有发展成系统的学说,因而总体来看,中国地理学与欧洲中世纪类似,“于所谓人文地理学,尤毫无足述”。([40],19页)

其二是《礼记·王制篇》,该篇中曾有言: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

^① 竺可桢在1922年发表了题为《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的演讲,将拉采尔称作“人文地理的鼻祖”。作为竺可桢的学生,张其昀很有可能看过此文,或了解此观点。见竺可桢:《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科学》,1922年第6期第739页。

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张其昀将此句解读为“根据于天然区域之人文地理学”(Regional-Human Geography),认为此论述“诚不愧为世界最古之地理学说”,可以充分体现“地理与人生之关系”。但是张其昀也强调因为《礼记》精神的“失传”,使得后世地理不过是一部部“地名词典”。^[68]

其三是《史记·货殖列传》,张其昀认为其中蕴含了“天然区域”、“环境与人生之影响”等近代地学的基本观念。值得一提的是,张其昀正是在介绍了西方地理学发展脉络后,提出“吾国殆有同然”,并由此引出《史记·货殖列传》。^[69]

显然,上述论者将所论文献,放置在西方近代地理学发展谱系下进行讨论,人地关系是重要的思想资源。部分学者在积极挖掘中国传统地理中的近代要素的同时,又认为这些内容不过昙花一现,贬低其他内容,惋惜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近代地理学,实际上是遮蔽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这些学者建构出一种关于中国地理学的叙述:可能远早于西方就产生了近代地理因素,却最终未能进一步发展。整理国故是学者们挖掘中国传统地理、写作地理学史的思想来源之一。前文提到姚从吾对《汉书》和刘献廷的重新评价^①,以及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率先挖掘^[70],均受到整理国故的影响。

此外,在挖掘传统地理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南派地理学者。在学术上,南派地理学者主张立足本土,“注重从历史上发掘地理”([39],104页),试图将西方地理学嫁接在中国文本之上,建立中国地理学范式。人地关系论是南派地理学者挖掘传统的重要理论资源。他们接续了姚从吾、丁文江对部分古代学者的讨论,同时又主动从中国典籍中找寻近代地理学因素。南派地理学者还依托顶级院校与科研院所,充分利用自身掌握的丰厚资源来推广学术观点。例如,他们通过重走“徐霞客之路”、举办纪念会、动员学者撰写文章等方式,深化对徐霞客的研究。([62],1699页)南派地理学者也积极为地理教育的发展建言献策^②,刘献廷的地理学成果及意义被张其昀写进其主编的《本国地理》之序言^③,进一步扩大了影响。^[69]相比之下,北派地理学者对挖掘传统兴趣寥寥。^④

3.2 认为中国传统地理中几乎没有可以称得上地理学的内容

这也是以西方地理学的发展为标尺,来评判中国传统地理,代表人物是王庸。王庸(1900—1956),字以中,与张其昀同辈,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北上前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深造,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加入禹贡学会,与北方学界交往密切,是史地学界少有的横跨南北的学者。([39],91页)王庸翻译过西方地理学著作^[71],对西方地理

① 姚氏 1919 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等人,1920 年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史门研究生。见王德毅:《姚从吾先生年谱》,《台大历史学报》,1974 年第 1 期第 4 页。北大国史门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之一。

② 例如中央大学创办《地理杂志》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中学地理教育”。见《发刊辞》,《地理杂志》,1928 年第 1 期。

③ 该书是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地理教材之一,任美锷院士和施雅风院士的回忆都提到,他们对地理学的兴趣是在阅读了张其昀版《本国地理》后产生的。见韩存志、汤佩松:《资深院士回忆录》卷 2;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3-14 页;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24、28 页。

④ 在“南派”地理学者挖掘徐霞客的同时,“北派”地理学者则在积极接触以研究中国地理学而闻名的美国学者葛德石(George Cressy)。见张雷:《南胡北黄:民国地理学的分野(1936—195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 年第 4 期,第 101-103 页。

学的发展谱系较为清楚^[72],具有较深厚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地理学史》出版之前,王庸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对中国古代地理的大体判断。1933年他在《人文地理学和张其昀的地理著作》一文中指出,西方地理学可按“人地关系论”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中国古代地理学缺少“人地关系”方面的内容,所以归于史部是合理的。([72],57页)这里王庸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通过中西对比,来否定中国古代地理学价值的倾向。《中国地理学史》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民国时期唯一的中国地理学通史。此书有相当多的内容取材于他人作品,如第四章的内容取材于张其昀的论著;第三章关于宋代志书的部分,主要参考了吴其昌的文章;而清初测绘地图的部分,主要取自翁文灏的《清初测绘地图考》。该书对中国古代有多少知识符合近代地理学标准的判断更加明确:

严格地说,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73]

所以王庸在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地图、地志以及西学东渐后的中国地理学,而较少讨论《山经》、《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古代地理典籍。在此书中,王庸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否定态度明显。王庸认为,中国古代基本没有自然地理学,而人文地理学应以人地关系为基础,但是“近今所谓人文地理学,多仅有言人文而与地理环境无关者,是皆承古来地志之旧习,实不足为真正之人文地理学也。”([73],255页)上述言论不仅批评了古代地理志,也批判了当时的地理学研究。由此观之,王庸点评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的指导观念也是人地关系,这与上文所论“南派”地理学的挖掘标准是一致的。然而,与张其昀等人不同的是,王庸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体现人地关系理念的著作,这可能与王氏的学术观念有关。

王庸于1926年发表《怎样才是人生地理学》,提出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五大原则:多方面的、理解的、实证的、区域的、历史的。^[74]以此为基础,王庸进一步指出,张其昀的著作,严格来说都不算真正地谈论“人地关系”,多属“近于文艺的叙述,而不注意逻辑的条理”([72],64页)。在王庸看来,作为推动“人地关系论”旗手的“南派”干将张其昀,尚且没有从事真正的“人地关系”研究,那些被“南派”地理学挖掘的诸多学者和著述,恐怕更称不上谈论人地关系了。^①张其昀和王庸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差异,影响到了两人的地理学史写作。

如前文所言,民国时期编写过西方地理学史的学者,有部分持有对中国地理学史的关怀。例如,挖掘刘献廷和《汉书·地理志》人地关系意义的姚从吾,就曾翻译过西方地理学史。翻译过马东男所著《地理学史》的竺可桢,重点谈论了沈括和徐霞客的近代地理学意义。考察了《礼记·王制篇》、《史记·货殖列传》、刘献廷以及徐霞客的张其昀,翻译过《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还在《本国地理》教材的序言中对比过中西地理学发展的异同。^[69]楚图南则直接在介绍西方地理学史时,提及《汉书·地理志》和中国地理学。王庸也曾比较过中西地理学的发展路径。这些作者有意在地理学史写作中将东西地理学进行对比,来重审中国传统地理。

① 当时的“禹贡”成员顾颉刚、郭敬辉都批评过张其昀的研究,同为“禹贡”成员的王庸可能受此影响。见张雷:《南胡北黄:民国地理学的分野(1936—195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年第4期,第93页。

西方学者所写的地理学史,曾长期忽视中国地理学。赫特纳就直言:“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16],6页)。换句话说,中国地理学并不属于赫特纳心中的科学地理学谱系。杰弗里·马丁(Geoffrey J. Martin)的地理学史著作,虽题为《所有可能的世界》,但实际上该书并未描绘出真正的“所有可能的世界”,至少较少提及中国地理学。^[75]大卫·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的地理学史经典作品《地理学的传统》(*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也几乎未涉及中国地理学。^[18]

部分民国学者的研究趋势与此类似。他们以西方眼光来审视中国地理,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地理学,或认为即使有也仅“昙花一现”,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地理学。于是,在这些学者笔下,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价值和成就有限。这种写法有历史背景。自梁启超以来,中国的趋新知识分子认为用西方眼光、观点来看待中国传统学术是正当的,这种方法有胜过昔人之处。罗志田据此指出,近代“中国士人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的自我‘东方主义’倾向仍极为明显且更居主流,持续得更长久”。^[76]笔者认为,上述民国学者的中国地理学史写作,是西方学术在近代逐渐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之后,所展现的文化霸权的影响,值得我们警惕。

4 结 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民国学者的地理学史论著。民国时期编纂地理学史者,多为职业地理学者,而非专业的地理学史或科学史研究者。这些学者处在近代地理学科逐渐在中国展开的时代,编写地理学史的目的侧重介绍学科谱系,以促进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在其笔下,地理学史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确立地理学发展谱系,明确学术传承,建立近代学科;其二,表达编写者的学术旨趣或当时的学术潮流;其三,沟通中国的传统地理与近代地理。

孙俊、潘玉君等通过一系列文章,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地理学编史学的几种范式。其一是“实证主义地理学史”,继承自萨顿(George Sarton)的科学史方法,具有进步主义色彩,以描述地理学的直线发展为主,强调作为科学的地理学的进步史;其二是“思想史方法论的地理学史观”,主张把地理学的发展看成复数的,强调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所指”,强调社会文化对地理学的影响。([75],1846-1854页)民国学者的西方地理学史写作,基本属于“实证主义地理学史”,即以科学地理学的发展作为主要描述对象。

部分民国学者以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作为参照,来写作中国地理学史。这种研究可能会遮蔽中国传统地理的独特价值。笔者认为,在写作中国地理学史时,不应以西方地理学史作为参照,而应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脉络出发,视其为独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相对客观地编纂和研究中国地理学史。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民国时期中国地理学史编纂的价值。^① 民国学者

^① 当然,民国亦有一些中国地理学史写作并未参考西方地理学史,不过影响力相对有限。见尹耕:《刘继庄的生平及其学术概要》,《齐大学刊》,1933年第2期。

挖掘的典籍和人物(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沈括、徐霞客、刘献廷等),日后都成为中国地理学史讨论的重点。^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侯仁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等为代表的学者和学术群体,更注重从中国自身脉络出发来研究地理学史^②,展示中国地理学的成就。^[77-78] 而人地关系论因受到批判^[79],不再被学者们用来重审中国传统地理。随着中国科技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包括体系化的研究生培养、科研院所的成立、学术期刊的创立等)^[80],职业的地理学史、科学史研究者越来越多,其研究极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地理学史的了解。

致 谢 匿名评审专家、邹大海研究员及编辑部老师为本文的写作与修改提供了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张剑.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学和科学体制化[M]. 北京:工人出版社,2022.
- [2] 张雷. 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J]. 地理学报,2017,72(9):1695-1701.
- [3] 唐晓峰.“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46(2):81-91+144.
- [4] 孙俊,潘玉君,汤茂林,等. 中国地理学史编史方法论考察[J]. 地理研究,2014,33(8):1557-1568.
- [5] 孙俊,潘玉君,汤茂林. 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理路分析——兼论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J]. 地理研究,2014,33(3):589-600.
- [6] 张其昀. 地理学与大学教育[J]. 地理杂志,1929,2(6):1-5.
- [7] 张沦波. 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J]. 地学季刊,1(3):29-36.
- [8] 任美鏊. 现代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J]. 中央时事周报,1934,3(28):12-19.
- [9] 张其昀. 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J]. 科学,1936,20(9):722-736.
- [10] 林超. 现代地理学问题检讨[J]. 文化先锋,1942,1(1):27-29.
- [11] 孙俊,潘玉君. 中国高校地理学系概览 1912—1949[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287.
- [12] 附录(二)中国科学史社章程[J]. 现代史学,1936,3(2):3-4.
- [13] 丘式训. 地理学及其分类研究方法[J]. 学生杂志,1931,18(8):79-89.
- [14] 刘国雄. 地理学是什么[J]. 教育论坛,1933,2(7):68-84.
- [15] 盛叙功. 论所谓人地相关之理[J]. 史地丛刊,1933(1):1-5.
- [16] 阿尔弗雷德·赫特纳. 地理学[M]. 王兰生,译. 张翼翼,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 [17] 理查德·哈特向. 地理学的性质[M]. 叶光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
- [18] LIVINGSTONE D N.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2: 6-7.
- [19] MAYHEW R J. Geography's Genealogies[C]// JOHN A A, DAVID N. LIVINGSTONE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11: 21-38.

① 例如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就不断被学者讨论。见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期;吴宏岐,王元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② 例如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序言中指出,“如果说我国地理学没有获得什么发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笔者认为这有可能是在与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史研究者对话,尤其是王庸。见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 [20] 存吾. 近代地理学之起源;简译自纽华金近代地理学之第一篇[J]. 地学杂志,1921,12(3):151-159.
- [21] 现代地理学之始源[J]. 盛叙功,译. 地学杂志,1922,13(3):723-730.
- [22] NEWBIGIN M. *Modern Geography*[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1.
- [23] W L G J. *Modern Geography* by Marion I. Newbigin[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11, 43(12).
- [24] 纽碧君. 近代地理学[M]. 王勤培,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 [25] KELTIE J S, HOWARTH O J R. *History of Geography*[M]. London: Watts & CO, 1913.
- [26] 地理学之起源——地理学史(History of Geography)之第一章[J]. 潘维朥,译. 地学杂志,1922,13(1):478-487.
- [27] 开尔底,霍华茨. 希腊人与罗马人之地理学[J]. 潘维朥,译. 地学杂志,1922,13(2):588-595.
- [28] 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本质[J]. 葛绥成,译. 科学,1933,17(3):1733-1754.
- [29] 牟仁水. 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史[J]. 民鸣月刊,1937,1(10):50-63.
- [30] 狄更生,霍瓦士. 地理学史[M]. 王勤培,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 [31] 德铿生,霍威尔士. 地理学发达史[M]. 楚图南,译. 上海:中华书局,1940.
- [32] 竺可桢. 地理对于人生之影响[J]. 科学,1922,7(8):739-756.
- [33] 周立三. 地理学之对象及其任务[J]. 地理,1941,1(2):127.
- [34] MARTONNE E D. 欧西地理学发达之历史[J]. 竺可桢,译. 科学,1926,11(2):20-47.
- [35] 曾潍嘉.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地理学”与“人生地理学”内涵演变研究[J]. 历史地理研究,2019,39(1):149-158+164.
- [36] 白吕纳. 人生地理学发达史[J]. 张其昀,译. 地理杂志,1929,2(5):41-44.
- [37] 张其昀. 地理类十种[J]. 史地学报,1923,2(5):104.
- [38] 胡焕庸. 新地理“New Geography”[J]. 史地学报,1923,2(3):1-2.
- [39] 张雷. 南胡北黄:民国地理学的分野(1936—1952)[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106):87-114.
- [40] 楚曾. 人文地理学之发达及其流派[J]. 地学季刊,1935,2(1):17-33.
- [41] 李长傅. 地理学本质论[J]. 地学杂志,1935,26(1):2-8.
- [42] 李长傅. 转形期的地理学浅释[J]. 地学季刊,1936,2(4):21-26.
- [43] 盛叙功. 西洋地理学史[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83.
- [44] 威特弗格尔. 地理学批判[M]. 沈因明,译. 上海:辛垦书店,1935.
- [45] 丁逢白. 介绍“地理学批判”[J]. 文化批判(北平),1936,3(3):161-163.
- [46] 中华地学会会员录[J]. 地学季刊,1932,1(1):2.
- [47] 刘寅春. 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学术团体:中华地学会[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33(1):34-46.
- [48] 李长傅. 科学的地理学之新转向[J]. 地学季刊,1935,2(3):25-30.
- [49] 尤其鑫. 中国地理学界的马克思主义首传及其异质性——卡尔·魏特夫与上海“中华地学会”的思想史解蔽[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5):92-99.
- [50] 盛叙功. 科学的经济地理学[J]. 地学季刊,1932,1(2):29-60.
- [51] 拉茨罗夫斯基. 自然与社会之关系[J]. 李长傅,译. 地学季刊,1935,2(3):17-24.
- [52] 麻星甫. 楚图南年谱[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14.
- [53] 保罗·克拉瓦尔. 地理学思想史[M]. 郑胜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4-105.
- [54] 胡焕庸. 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J]. 地理杂志,1929,2(3):1-8.
- [55] 何沛东. 近代区域地理学被中译为“方志学”现象的探析[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37(1):15-26.
- [56] 李旭旦. 评哈特向著地理思想史论[J]. 地理学报,1943(10):139-146.
- [57] 李旭旦. 人生地理学之近今趋势[J]. 国立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44,2(1):53-67.
- [58] 李春芬. 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J]. 地理学报,1948,15(1):21-30.
- [59] 张雷. 李旭旦:为学地理负半生[J]. 澎湃新闻,2019-02-11.
- [60] 刘迪. 李春芬:以毕生之力开拓世界区域地理研究[N]. 文汇报,2020-12-26(4).
- [61] 竺可桢. 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J]. 科学,1926,11(6):792-807.
- [62] 张雷. 再造徐霞客——民国科学地理学[J]. 地理学报,2017,72(9):1695-1701.

- [63] 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J]. 新民丛报, 1904, 3(5): 1-16.
- [64] 姚存吾. 述大兴刘献廷先生之地理学说——读广阳杂记[J]. 地学杂志, 1922, 13(8, 9): 5-11.
- [65] 张其昀. 学地理之兴趣(为中学生言之)[J]. 史地学报, 1923, 2(4): 3-4.
- [66]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316.
- [67] 姚士鳌. 历代地理志评议(续上期)[J]. 地学杂志, 1921, 12(2): 11.
- [68] 张其昀. 初级中学世界地理编辑例言[J]. 史地学报, 1924, 3(3): 15-17.
- [69] 张其昀. 本国地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2: 2.
- [70] 简君玲. “整理国故”与“接轨西学”: 论丁文江对徐霞客再阅读的意义[J]. 东华中国文学研究, 2015(3): 119-146.
- [71] 宋继煌, 王庸. 白兰士氏人地学序[J]. 地理杂志, 1934, 7(3): 34-46.
- [72] 王以中. 人文地理学和张其昀的地理著述[J]. 图书评论, 1933, 1(5): 55-65.
- [73] 王庸. 中国地理学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1.
- [74] 王庸. 怎样才是人生地理学? [J]. 清华周刊, 1926, 25(16): 914-920.
- [75] 孙俊, 潘玉君, 武友德, 等. 地理学编史方法论: 从实证主义到思想史[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12): 1845-1860.
- [76] 罗厚立. “东方主义”与“东方学”[J]. 读书, 2000(4): 3-12.
- [77] 侯仁之. 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2.
- [78]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 编.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 [79] 胡志良.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文地理学批判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 31(2): 86-91.
- [80] 张柏春, 李明洋.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 70 年[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9): 1071-1084.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Concepts of Geogra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Pengwe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Chinese geographers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a key e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modern geography. After translating several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and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genealogy of modern geography, these scholars began to write their own history of geography. In this process, different ideas about geography influenced the writing of the work, and scholars wrote in various styles about it. Some geographers also use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geography as a reference to ex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eography. They either believ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geography already contains elements of modern geography, or that it basically did not have any content that could be called geography, and similar controversies reflect the divergence of academic concepts. The treatises o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serve as valuable 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history of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ory; southern school of geography; Zhunghua Geological Society (Zhonghua Dixuehui 中华地学会); Wang Yong (王庸)